

# 现代化理论的过去与现在

谢立中

“现代化理论”是当代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五六十年代曾经主导过发展问题的研究。六七十年代间，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具有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自家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趣又重新抬头，“现代化理论”似乎已经复兴，并正在重新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

## (一)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传统”与“现代”。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那么，什么是“传统”社会，什么是“现代”社会呢？怎样才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过去和今天都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们都曾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二者的差异。综合他们的看法，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1) 从经济方面看。现代社会是工业和服务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非生命能源占据较大比重的社会；传统社会则是第一产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或所使用的全部能源中生命能源占据较大比重的社会。

(2) 从政治方面看。现代社会普遍具有一个有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一体化的政府组织体制，它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政治决策，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各种条例的制定是以法律为基础，而传统社会则多数不具备这些特点。

(3) 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各组织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社会的流动率也很高；人口大规模集中于城市；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个人的能力和业绩；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标准化的、普遍主义的；科层制普遍发展；家庭功能缩小，地位下降等。传统社会则是低度分化的社会，组织间的专业化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低；社会流动率低；人口主要分散在乡村；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据出身、年龄等

先赋因素；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是特殊主义的；科层制即使有也限于某些领域；家庭具有多重功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等。

(4) 从文化方面看，现代社会的文化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功能至上等观念；传统社会的文化则强调超验的、反个性的、知足常乐的、先赋性至上的、情感至上的价值观念。

(5) 从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上看，现代社会的成员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在处理有关事务时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主性，对新事物有高度的开放性，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参与感，对生活其中的世界有较高度信任感，等等；传统社会的成员则缺乏这些基本素质。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具有上述“传统”特征的社会，逐渐消除这些特征，同时获得上述种种“现代”特征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也大都同意它具有以下特点：<sup>[1]</sup>

(1) 现代化是一个彻底的转变过程。为了使一个社会从传统形态转变到现代形态，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用一套全新的“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结构来取代旧的“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结构。

(2)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变。一旦某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就必然要求或导致其它领域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

(3)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就得以完成，往往要以世纪来计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又是一个渐进性的进化过程。

(4) 现代化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它从传统阶段开始，以现代阶段告终，中间还可以划分出几个小阶段，而且，一切社会都要经过大致相同的若干阶段。

(5) 现代化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必须具有内部的动力和条件才能够得以发生和持续。

(6) 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从欧洲开始，通过传播等途径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是传统社会，而所有的社会也都将转变成现代社会。

(7) 现代化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相似性将日益增加。现代化程度越高，各社会在各方面的相似性程度也就越高。最后整个世界将变成一个同质的实体。

(8) 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溶剂”<sup>[2]</sup>，所有与之接触的社会与领域都不可能长期抵抗住它的溶解力。而且在任一社会中，现代化一旦开始，就不可被真正抑制。可能有暂时的挫折和倒退，但总的趋势不可逆转。各国以及各领域现代化的速度可以不同，但总的方向却不会不同。

(9) 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带来一定的痛苦和代价，但从长远来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各方面的福利。

上述这些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过程之特点的看法，构成了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命题。这些看法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获得了普遍接受。然而由于下面将要提到的一些固有的缺陷，这种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模式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挑战。

## (二)

虽然从广义上说，可以把从洛克以来，到孔德、斯宾塞，再到迪尔凯姆、滕尼斯和韦伯

的社会发展理论都看作是现代化的理论<sup>〔3〕</sup>。然而，五六十年代得到正式命名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却有着自身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使命。前者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为对象，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总结；后者则是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曾属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现代化”过程为对象，试图“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作出揭示”<sup>〔4〕</sup>。然而矛盾之处在于，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借以用来描述和讨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那些理论命题与模式，却主要是在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等人所阐发的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础之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而概括出来的。因此，问题便出现了：这种参照西方社会的经历而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运用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呢？

事实表明，如果把早期流行的这种现代化理论模式简单地套用到非西方发展中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它把传统与现代置于截然对立的两极，认为传统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现代”因素将“传统”因素完全取代，而事实上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在很大程度似乎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支持的。

早期现代化理论模式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在60年代末已开始广泛为人们所认识。许多人开始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早期现代化理论进行批评。

一部分批评来自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内部，包括古斯菲尔德、本迪克斯、艾森斯塔德、亨廷顿、蒂普斯等人。他们指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模式至少包含以下问题<sup>〔5〕</sup>：

(1) 对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理解过于简单。首先，“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是一种过于简化的抽象，事实上无论是已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未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将它们笼统地归为两类对现代化研究弊多利少；其次，将“传统”与“现代”当作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极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它们不仅是相互共存的，而且还可以是相互促进的，这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再次，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先进”也是不恰当的，“传统”并非什么都不好，“现代”也并非处处都好；最后，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模式实际上是从已“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与未“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的差别中归纳出来的，因此它带有十分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从而将“现代化”变成了“西方化”。

(2) 对现代化的过程与道路理解得过于简单。它蕴含了一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现代化过程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正是非西方国家将要走的道路，并由此将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如渐进性、系统性、长期性、不可逆转、进步性、彻底性等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般特征，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它发展路径及其特点。

(3) 理论表述过于抽象。关于“传统”、“现代”以及现代化过程的讨论都停留在最一般的抽象层次上，缺乏具体的有时空限制的所指对象。这种脱离具体时空限制的理论模式，在运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历史过程时，自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类批评则来自“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学派的学者，包括弗兰克、卡多索、阿明、波特斯、沃勒斯坦等人。他们同样指出了早期现代化理论的“西

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认为这种以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模式不可能用来指导今天完全处于新形势下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不同社会在发展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单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来分析发展过程。而事实上外部环境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西方已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在开始各自的现代化过程时处于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之下，前者在世界体系中多居于独立的、中心的地位，后者则多居于依附的、外围的地位，这就使得它们的发展过程必然会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结果。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由于依附的存在，现存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将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

面对这些激烈的批评，现代化理论一度陷入徘徊状态。尤其是来自“依附论”等对立学派的批评，对现代化理论的打击更为沉重。60年末、70年代初，作为一种研究取向，“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对立理论的声势明显超过了现代化理论。然而“依附论”等也有自己明显的缺陷。它们单纯从社会外部来寻找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原因，甚至由此得出不摆脱与西方中心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种结论，其片面性也是不能否认的。70年代以来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对“依附论”等无疑是一个很强的挑战，而对现代化理论则似乎是一种强心剂。它似乎表明，外部因素并非像“依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理解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内部因素也并非可有可无，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非毫无希望，而“现代化理论”也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的兴趣又重新复苏，人们积极探讨建构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可能性，以现代化理论（当然是一些新的现代化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 (三)

事实上，即使在现代化理论声势下降的时期，现代化理论家们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停止自己的研究。上述那些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内部对早期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的人，也正是新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开拓者。他们一方面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模式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积极探索，试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形成一种新的、具有更高解释力的现代化理论。他们有时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在这些学者当中，古斯费尔德对传统与现代化之关系的重新考察，艾森斯塔德对大量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具体比较研究，亨廷顿对政治现代化所作的重新分析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学者C·布莱克主编或撰写的《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和《比较现代化》等书，则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给予了另一个推动。布莱克明确反对现代化即西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与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他指出，“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sup>〔6〕</sup>这就要求现代化理论家们去对不发达国家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德国学者茨阿波夫(W. Zapf)是另一个对新现代化理论给予了重要推动的人物之一。70年代，茨阿波夫将部分现代化研究文献译成德文，附上他自己的序论，以《社会变迁理论》为名出版，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使“现代化理论”成了70年代德国众所瞩目的课题，推

动了现代化理论在德国的发展。80年代以及90年代以来，茨阿波夫又陆续发表了《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等著作与文章，对现代化理论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与全球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相适应，无论是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还是这两类社会内部各国之间，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向；必须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对现代化的不同层次、不同路向进行细致地探讨，才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新的现代化理论。<sup>〔7〕</sup>

对迅速发展的东亚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研究热潮构成了推动现代化理论发展与革新的又一个动力源。与拉美诸国的发展过程相比，东亚诸国的发展过程明显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发展过程的持续性等等。这对现代化理论家们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东亚发展模式”已成为现代化研究文献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总的来看，各种“新”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并不完全类似，但也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 它们仍然具有早期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如仍然以“传统”和“现代”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仍然将“现代化”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对包括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本质上应该是种内在的过程，必须具有了内部的动力和条件才能得以发生和持续；等等。由于这些特征，使得它与“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继续区别开来，而与早期现代化理论在核心范畴与理论假设上保持一定的继承关系。这就是它们之所以仍被称作“现代化理论”的原因。

(2) 它们又都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因而与后者相比又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异。概括起来，这些差异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它们不再把传统与现代性看作是两个内部始终如一的、均质的统一体，而是认为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性内部都包含着性质不同的要素；不再把传统和现代性当作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而认为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的；不再把传统笼统地都视为是现代化过程的阻碍因素，而认为有许多传统因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再把现代化过程简单地看作是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彻底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而是认为现代化过程可以是一个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化之要求的过程。第二，它们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西方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其它国家将要走过的道路，因而不再简单地套用从西方国家经历中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和说明非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而是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向和模式；与此相联系，它们也不再满足于对现代化过程作抽象的描述和分析，而是更加注重具体的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三，它们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虽然其重点仍在内部因素方面，但它们不再忽视外部环境因素在模塑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期望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来考察现代化过程。第四，它们不再拘守在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范式之内，而是企图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不再简单地把现代化过程描述成一个分化、整合、适应能力升级的进化过程，而是试图把各种压制、不平等和冲突现象纳入分析的范围。所有这些区别，都使得新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于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这不仅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基础，而且也现代化研究“开启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由此而获得新的活力。<sup>〔8〕</sup>

当然，从目前来看，这种所谓的新现代化理论还不是一种已完成的理论。与其说它是一

个已建构起来的统一的理论系统，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新理论运动，一种大体趋同的理论取向。它将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我们愿意对它有所期待，并为此付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

#### (四)

在今天这个时代，说到现代化理论，不能不说到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因为正是这种“后现代理论”，向整个“现代性”、整个（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内的）“现代化”过程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挑战。

与“后现代理论”所提出的挑战相比，“现代化理论”在六七十年代遇到的来自“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方向的挑战就近乎于是一场儿戏。以“现代化理论”为一方，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理论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争论，实际上不过是围绕着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的起因、条件、道路、后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而展开的。无论是它们当中的哪一方，都不曾否定过“现代化”对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必要性、可欲性。“依附论”等理论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评，并不是要否定现代化作为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奋斗目标所具有的价值，而只是要否定“现代化理论”对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状态所作的解释，否定“现代化理论”向非西方国家所推荐的那种“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它们希望的，是为非西方国家人民找到一条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可行之道。实际上，“现代化理论”也好，“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也好，都是将“现代化”作为人类的奋斗目标，都是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方案、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其实都是有关“现代化”的理论，或都是“现代化理论”。它们之间的争论，乃不过是自家内部的纠纷而已。

“后现代理论”所提出的挑战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这个一切“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根本上加以质疑，否定“现代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性”（严格地说应该是“工具理性”）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合法性，从而也就是对“现代化”本身的价值，以及对探讨、促进“现代化”过程为己任的一切“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正如韦伯等人明确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如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的普遍运用（技术现代化），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现代化），一体化、法制化和集权化的国家体制的建立（政治现代化），科层制的普及（组织现代化），以功能、绩效原则为基础的高度分化与流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现代化），理性至上、个人至上、成功至上、能力至上、效率至上的价值观的确立（文化现代化）等等，都不过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不同方面。现代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如专业化、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系统化、控制化等都是社会生活全面“理性化”的条件与结果。现代化说到底依赖于人类借助（工具）理性来实现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控制能力的增长。后现代理论家们认为，这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控制能力的增长，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性后果。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规模征服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它对人类自身的持续生存造成了威胁；对

社会生活本身的有效控制则使人类本身陷入全面的、无所不在的被监禁和被支配状态之中；科学、理性取代传统和宗教成了唯一的、不可反抗的合法性准则，因而也就成了支配——被支配关系的新的基础。据此，“后现代理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是一项失败的工程。后现代理论家们竭力瓦解现代文明的理性基础，试图推动一种建立在比单一理性更为宽广的多元基础之上的新文明——“后现代世界”的出现。

不可否认，“后现代”即使在西方也还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后现代理论”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系统，“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攻击肯定有着过激之处，但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忽视“后现代理论”的根据。我们不必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面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批评和挑战，每一个置身于或关注于现代化过程的人都不应该无动于衷。对这种批评和挑战，每一种研究“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理论都必须作出回应。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性”或“现代化”本身作为目标的合法性。从这些批评和挑战中，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者们也许能得到一些新的灵感或启示。对于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的学者们，更应该如此。实际上，后现代理论家们对“现代性”或“现代化”所作的批评，主要是以对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为基础的，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已有的“现代性”及现代化模式的弊病，这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从这点来看，“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评与“新现代化理论”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之间，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这似乎也预示了“新现代化理论”具有一定的、将“后现代理论”的一些“合理内核”吸收到自身之内的逻辑基础。详尽阐述上述观点，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只作这样一些简要的阐述，目的只是在于引起有兴趣于现代化研究的人们对“后现代理论”的关注。

注释：

〔1〕 参见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政治和发展》，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加利福尼亚，Sage出版公司，1990

〔2〕 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莫尔和库克编：《社会变迁读本》，189页，新泽西普伦梯思—霍尔出版公司，1967

〔3〕〔4〕 参见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5〕 参见古斯菲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对立》，载《美国社会学月刊》，第

72卷；本迪克斯：《传统与现代性的再考察》，载《历史与社会中的比较研究》，第9卷；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研究与社会学理论》，载《历史和理论》，第13卷；亨廷顿：《导致变迁的变迁》；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苏耀昌：《社会变迁与发展》等。

〔6〕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7〕 W. 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4）

〔8〕 苏耀昌：《社会变迁与发展》，60—62页，加利福尼亚，Sage出版公司，1990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市 100871）

责任编辑 何 频